

梵二後的教友職務： 扎根教會、建設天國

徐錦堯

簡單的定義

先解說一下題目的各個名詞。

- 教友：指天主教內的所有平信徒，男女老少，沒有例外。
- 職務：指教友自領洗時直接承受自基督的授權和派遣；這個教友的職務直接來自基督，不是來自神父或主教；所以扎根教會建設天國是教友的本有權利，是天賦的，是責任，也是權利。
- 建設：指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少到多，從發芽到生長到開花結果。那應是教友一輩子的任務，要讓基督的精神滲透一切。
- 教會：即那個基督所建立的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大公教會。這個教會是精神的、也是有形可見的羅馬天主教會。
- 天國：指天主為王的那個國度。在那裡天主以愛統治一切。只有天主是主、是眾人的大父母，眾人彼此都是兄弟姊妹。在這個國度裡，一切都屬於上主，他卻把一切交給了我們，要我們善用去使所有人和每一個人都活得快樂，由今生直到永遠。這個天國超越一切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民族、文化、地域和國家的界限。

以鏡自照見形容，以心自照見吉凶

我自 1971 年升神父以來，至今常縈繞在我心中一個驅之不去的念頭，就是「福傳」或「傳福音」的問題。那麼美好、那麼漂亮、對社會和人生都有那麼重大貢獻的天主教信仰（特別是梵二所強調的信仰），為什麼老是傳不開去呢？

香港教區有一句十分醒目的口號：「找到天主是福中之福」。但為何這麼有福、美好的信仰，我們信了以後、找到以後、獲得以後，竟然有四分三的人不太珍惜？因為無論我們說信仰多好、聖事多好、主日彌撒多重要，但忠於去主日彌撒的教友卻竟然只得四分之一呢？

在傳教上，我們天主教更是遠遠及不上佛教、道教和基督新教。

下面是一位武漢大學教授所作的一個調查，資料也許不是很準確，卻也值得我們深切的反省。

他說：「大陸天主教的危機首先是發展緩慢」。以下是他的統計和觀察：

如果以 1949 年大陸政權更迭為界，此前全國信友大約有 300—400 萬，約占總人口的 1%；現在究竟有多少，沒有人能說的很準確，從 500 萬到 1200 萬，差距很大，如果取平均數 850 萬的話，比例是占全國總人口數的 0.65%。也就是說，縱向比較，中國天主教不僅沒有發展，反而降底了。

如果與基督新教相比，那天主教就差的更遠了。

半個世紀前，內蒙古包頭市有一個天主教堂，現在增長到了 5 個；基督新教原來也是一個，現在增長到了 69 個。單從教堂數量上就可以看出巨大差別。

瀋陽市 1980 年剛恢復宗教活動時有一萬多信友，現在還是一萬多；而新教從那時的 248 人發展到現在的 18 萬人，增長七、八百倍。

吉林省的吉林地區 1949 年的天主教與新教旗鼓相當，現在天主教信友有 5000 人，而新教有 13 萬人，相差 26 倍。

1949 年新教全國只有七十萬，現在已有數千萬。

按照這位教授的觀察，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傳教的效率，兩者相差達十倍或以上。

以上是大陸的情況，香港又怎樣？

香港教區的神父包括教區神父與修會神父在內，合共 306 人，加上修會的修士，多達 380 人；修女超過 500 人。教友更多達 35 萬餘人。這些數字，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單一的華人教區中，無出其右。

但論到教會的接班人，卻令人很擔憂。香港的神父修女們的平均年齡，早已超過 65 歲，但聖召卻少得可憐。這麼大的教區只有 8 位修生，即七年內每年只有 1.1 位新神父（如果都能修道成功的話）；18 個男修會中，只得 9 位修生和 13 位初學生；28 個女修會中，也只得 6 位初學生、22 位先修生，平均每修會剛好只有一位「可能的」接班人（也是假設她們都能修道成功；但這卻非易事）。

主日去教堂人數已如上述，只有四分之一。

而教區每年增加的新教友，七歲以上的每年都不足 3000 人，若以香港教區教友總人數 353000 人頭來算，則每 117 位教友，才

能每年找到一位皈依者。怎麼一百多人才找到一隻亡羊？這哪裡算得上是有福傳心火啊！

天主教徒閱讀教會書籍的風氣更是驚人的低落。以 35 萬教友的規模，絕大部分的公教書籍，印刷數量都不超過二千（遑論購買和閱讀），大多數都在一千上下，有不少書籍的印數和銷量更是只得三、四百本而已！

有一個平信徒傳教的真實例子，令我至今不能釋懷，那是我於 1960 年代在香港聖神修院讀書的日子。那時我偶然會被派往修院附近的葛量洪醫院做牧民工作（其實是「實習」），知道該院有兩名天主教學護（護士學生）和兩名基督新教學護。她們於四年後一起畢業，兩位天主教學護仍是兩人，而兩位基督新教學護，卻找到了四十位皈依者！

香港在美加澳紐等地的留學生情況，大概已是公開的秘密：天主教大學生皈依基督教的，遠比反過來的為多。

十多年前，基督新教會揚言可於一年內皈依菲律賓的一百萬天主教徒。我問一位菲律賓主教有沒有這個可能。他說：「如果他們真的『發力』，也許會不止此數！」

外國又怎樣？

十多年前當我去德國在東西德的多個聖堂巡迴講道時，我發現他們去主日彌撒的教友只有教友人數的 18%；後來我更發現，原來法國和意大利的教友進堂比率更低！

但我不羨慕基督新教傳得快，也不認為全社會都是基督徒有什麼好。理由很簡單，全南美洲大部分都是教友，又怎樣？菲律賓是亞洲唯一的天主教國家，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又有什

麼驕人的成績？澳門開教四百多年，還不是靠和天主教精神不太吻合的賭博起家？

美國又怎樣呢？

2008 年去世的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曾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調查，發現 92%的美國人宣稱自己信上帝，85%的人說自己是基督徒，70%以上說自己每主日參加崇拜或彌撒。他們有 200 基督教電視台，2000 基督教廣播電台。對基督宗教的熱誠和忠誠，超過印度教在印度，東正教在俄國，穆斯林在埃及，甚至猶太教在以色列。

但在這樣一個很基督教化的美國中，發起不義之戰的布殊為何能夠連任？美國對世界減貧滅貧的貢獻為什麼遠比天主賜給他們的財富為小？

世界為何貧富懸殊？還不是因為財富大部分都集中在信基督的國家中？為什麼在這些國家裡最富有的三個人，他們財富的總和可以等於 17 個窮國？而 500 個富人，他們財富的總和就等於四億一千萬個窮人（即 1 個這樣的富人等於 82 萬個窮人）？這些富人不是絕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嗎？他們有幾人會如匝凱跟耶穌相遇後說：「主，你看，我把我財物的一半施捨給窮人；我如果欺騙過誰，我就以四倍賠償。」（路 19:8）

還有，世界會不會因為信基督而更和平呢？看看歷史中的宗教戰爭，看看大陸的地上、地下教會的反目，看看教會內的各種明爭暗鬥，我們恐怕不敢輕言教會能為世界帶來和平。

2008 年 9 月，中國有「毒奶粉」事件，同期美國卻有「毒債券」（即金融海嘯），兩者都是唯利是圖和貪婪生出來的怪胎。中國是因為沒有神嗎？美國的神又在哪裡？這個神是不是像尼采

所說的「已經死了」呢？因為這位天主、這位上帝根本便影響不了信徒們的生活。

難怪大公會議認為「無神論出現在有神論之後，所以有神論的人要為無神論的出現而負責。」梵二的原文是這樣說的：「無神論並非原初就有的，出現的原因，是人們對基督宗教的批判。因此，有信仰的人對無神論的產生可能負有不小責任。首先是一些人對教義的虛妄詮釋，然後是（教會人士）自身在宗教、道德及社會生活的缺陷。因為教會不僅未將天主及宗教的真面目予以揭示，反而加以掩蔽。」¹

豐富整全的信仰內容

我看有兩個關鍵的因素在影響著我們，讓我們長久陷入福傳的困境：一是信仰的內容，二是教友的質素和活力。

在信仰的內容上，天主教好像有點進退失據。為什麼呢？

原來自梵二後，天主教已正式放棄了「不入天主教就不能得救」的講法，也不再強調孔子所說的「怪、力、亂、神」那一套。但許多其他宗教，卻仍然是以得救、奇蹟治病、驅魔、世界末日等等嚇人的方法來招攬信徒，而且表面上看來，這些「怪力亂神」的宗教推銷術也確有其成功的一面。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看我們只有全力而徹底的發揮梵二的「正視人生」的精神，才能重振天主教的活力。即強調宗教要與生活結合，教會要與社會結合，甚至信仰要與文化結合，而以導向一個「更豐富的

¹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19。

人生」為目的。這正是基督宣講的重點。更要發揮梵二的大公與包容精神，使天主教的信仰能成為未來大同世界的根基。

福音宣講的內容不應只是「教會」，而是「天國」，一種全面影響人生的天國信仰。

豐盛的人生一定要是全面的。它在個人方面要包含生命的全部：身體、理性、感情、道德、宗教、靈性。不能只著重靈性和限制在教堂中。在人生的周圍環境上要有完全的周延：扎根信仰、熱愛家庭（團體）、投身社會、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注目永恆。這也是《大學》裡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任何只著重某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的發展，不單無益，而且有害。試想：如果一個人一輩子只著重眼、耳、口，及心、肝、脾、肺的保健，而忽略了鼻和腎的保養，這個人能健康嗎？能快樂嗎？即使我們的靈修、家庭、個人都做到十足，但如果缺了社會、國家、世界和大自然這些宏觀的視野和發展，我們的信仰仍是殘缺不全的，那不是基督的「更豐盛人生」的信仰。

偏頗而不整全的發展不單無益，而且有害。對人如此，對教會也是如此。天主是宇宙之主，也是一切生命之主，他的啓示也一定是全面的、豐富的、整全的。

全方位釋放教友的活力

在教友的質素與活力上，天主教更是煞費思量。

誰都知道，天主教的教友質素並不差，而且比神職人員多上許多許多倍，如果不能釋放教友的活力，神職人員即使費盡九牛

二虎之力，也很難把福音傳出去，更遑論要滲透世界或移風易俗了。（說實在的，基督新教和佛教之所以能傳開去，主要便是「靠」平信徒。）何況，聖召又已經是愈來愈少了，教會單單靠著神職人員，又怎會有遠大的前途呢？

本來天主教有優點也有缺點，吊詭的是，有些缺點正正是由她的優點產生出來的。

教會強調的普世性、正統性和聖統制，原本都是優點，使教會能緊緊的合一與共融。但它本身也是一種缺點——一個包袱。

強調「普世性」，便少了多元性和特殊性，本地化也難以扎根。強調「正統性」，便難以出現創新、多方嘗試和勇於突破的局面。強調「聖統制」，便難於引發教友的活力，也難於讓教友在這個以神職人員為主的教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發展空間。

順帶一句題外話。看到月 2010 年 9 月 26 日公教報第 24 版的傳教節宣傳版面，出現的是一大堆神父和主教合照的壯觀場面，隱隱約約才看到幾個教友做背景，那也許只是照相時無法不把教友照上去而已。這樣的視覺效果，怎不叫人誤以為福傳只是神職人員的責任呢？這種以神職人員為中心的教會觀，已經是天主教的 DNA（基因），這種神職主義基因那怕是梵三、梵四都不會改得掉的。

我認為在肯定教會的普世性、正統性和聖統制的同時，必須全速發展基基團，以釋放蘊藏在廣大教友中的巨大潛力。因為基基團正是一個在與普世教會共融的前提下，以本地化、自發性、創新性和以教友為主的信仰團體。這樣，我們將會擁有基督新教「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優點，而又不失天主教獨有的大公精神和她的普世性、歷史性與合一性的特質。

我相信基基團本身也確實可以釋放教友的潛能。單單就教友在基基團中的「分享」練習，就足以使教友有機會聆聽、思考、表達、互相豐富、互相糾正。加上基基團的聚會內容是以聖經為中心，以生活為方向，讓團員能定期地經常思考信仰與生活結合的問題。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就會對聖經有更多的認識，對信仰有更多的體會，對生活有更多的了解，對教會也會有更大的歸屬感了。然後要他講出自己的信仰，或者為信仰作見證、傳福音，不是容易得多嗎？

下面《教會憲章》對教友的不可或缺的貢獻的肯定，很令我們驚訝，它說：「『在俗』是教友的特點。……教友的本有使命，是要在世俗事務中，照天主的計劃去安排，而企求天主之國。……天主把他們召喚到這種地位上，要他們以福音精神執行自己的職務，好像酵母，從內部聖化世界。……為使一切世俗事務得按基督的意志而進行，……就要靠與這些事務密切相連的教友們，去發揚領導。」²

容許我問一問：如何才可以訓練出這樣的教友呢？教友們「可靠」嗎？神職人員願意「靠」教友去福傳嗎？我自己相信，全力發展基基團，是十分可行的一個方法。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他的《救主的使命》通諭中，有一段有關「基層團體」的言論，十分精彩。他說：

「在新興教會裡有一種快速成長的現象，……即是『教會基層團體』，情況正在顯示這是基督徒的陶成和往外傳教的良好所在。這些是基督徒的團體，在家庭層次或在相似的侷限場所，相

² 《教會憲章》31。

聚在一起：祈禱、閱讀聖經、學習教理、討論人的問題、討論教會的問題。」³

「這些團體常保持與堂區團體的結合，……成爲基督徒生活的酵母，照顧貧窮者和被忽視者，並致力於社會的改變〔即移風易俗〕。」⁴ 面對不同的文化，而置身於本土化的進程，透過本土化，教會變成一個更可理解的標誌、更有效的傳教工具。⁵

當要討論「人」的問題時，它的內容必然也會進到身體生命、理性生命、感情生命、道德生命、宗教生命、和靈性生命等六大範疇。同時也會推而廣之，遍及扎根信仰、熱愛家庭（團體）、投身社會、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注目永恆等各個層次。當基督的精神能全面地滲透這一切時，不就是我們所說的「天國」了嗎？

³ 《救主的使命》通論，51。

⁴ 同上，51。

⁵ 同上，52。